

《元氏长庆集》版本源流考

周相录

白居易作元稹墓志，称元氏著文一百卷，题曰《元氏长庆集》。《新唐书·艺文志》又载元氏《小集》十卷。二书原本俱不传，《小集》是否从大集录出，亦不得而知。唐人别集，唐时俱无刻本问世，元集之最早刊刻本，是北宋宣和甲辰（1124）建安刘麟（应礼）募工刊行的，其序云：“元微之有盛名于元和、长庆间……其文虽盛传一时，厥后浸亦不显，唯嗜书者时时传录，不亦甚可惜乎？仆之先子尤爱其文，尝手自抄写，晓夕玩味，称叹不已，盖惜其文之工而传之不久且远也。乃者因阅手泽，悲不自胜，谨募工刊行，庶几元氏之文因先子复传于世……宣和甲辰仲夏晦日序。”（残宋蜀本卷首）可见宋时所传元集是由刘麟之父辑录而由刘麟募工刊行的。

北宋宣和六年（甲辰）梓行之建安刘氏本，世称闽本或建本，为后世所有元集之祖本，南宋时之蜀本、浙本俱从中出。宋蜀本宋代之后似无翻雕者，比较罕见，且至迟至清末已不见全本存世。傅沅叔《藏园群书题记》续集卷三《校宋蜀本〈元微之文集〉十卷跋》云：“元集残本，十卷，慈溪李氏所藏，存卷五十一至六十，凡十卷。忆戊申、己酉间，述古堂书贾于瑞臣得唐人集数种于山东，诡秘不以示人。余多方诂寻，乃得一见……《元微之集》十六卷，自一至六，又末十卷，即此册也。”此蜀本元集又有二十四卷残本。傅沅叔《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一二云：“《元微之文集》六十卷（唐元稹撰，存卷一至十四、五十一至六十，计二十四卷），宋蜀中刊本，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双栏，板心题‘微之几’或‘元之’，或‘元几’不一。首有宣和甲辰建安刘麟应礼序，钤有‘翰林国史院官书’大朱印，又‘刘体仁印’、‘公愚’、‘颍川榴考功藏书印’三印。”傅氏明谓残二十四卷本为“宋蜀中刊本”，但不知何故，张元济谓傅氏所见为“残宋建本”。《四部丛刊》影印明董氏本《元氏长庆集》附张元济跋云：“戊午之秋，江安傅沅叔同年得见残宋建本《元微之文集》卷一之十四、卷五十一之六十，凡二十四卷，刘序、目录并存。知全书六十卷，与是本合，惟编次微异（卷五之八并为乐府诗，即是本二十三之二十六四卷，是本卷五之二十二则递后为卷九之二十六），目录亦详略互见，已出宋人改编，非微之十体

原第。此多集外文章，源出越本，更在建本后矣。原书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一字，卷首有翰林国史院长方朱记，盖元代官书也。”宋蜀本前十四卷，王国维亦曾寓目，并断之为北宋刘氏建本之南宋重刊本：“宋刊本避讳至‘惇’字止，乃光宗后刊本，而此序‘先子’诸字上皆空二格，盖即重刊刘应礼本也。观其字体，亦建安书肆所刊。……建本有翰林国史院官书印，惜仅存前十四卷耳。”（一九一九年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三十一年董氏菱门别墅刻本，手跋于卷末）张氏所谓“残宋建本”，傅氏既已断为宋蜀本，且与今存残蜀本行款格式、作品编次、藏书印等无一不符，其为宋蜀本无疑。实际上，宋蜀本很可能是陈振孙所谓蜀刻《唐六十家集》之一种^①。近见王钰先生《〈元氏长庆集〉版本辨析》一文，以傅沅叔断所见十卷为蜀本为误，而以张元济、王国维断所见为“残宋建本”或“建本之南宋重刊本”为是，是以正为误，以误为正，误上复误矣^②。

宋蜀本系统的元集，卢抱经与其友人鲍以文曾见其全本^③。其《群书拾补》卷三五《元微之文集》云：“近鲍君以文复见宋刻全本，以相参校，真元氏元本也。首题《新刊元微之文集》……。”卢氏所谓“真元氏元本也”自是明显至甚之误，不足细辨。该本不仅书名全同今存残宋蜀本，而且卷次亦与残宋蜀本丝毫不差（参下文），其为宋蜀本系统的本子无疑。借助卢氏校记，比核卢氏所见“宋刻全本”与今存残宋蜀本，又可发现凡与明马元调刻本相异之处，卢氏所见“宋刻全本”与今存残宋蜀本存在非常多的相同之处。如明马元调刻本《解秋十首》第二首与第六首，宋蜀本、卢见“宋刻全本”两首诗位置互易，且第六首俱以首二句作末二句。又如卷五八《唐左千牛韦珣母段氏墓志铭》，残宋蜀本、卢见“宋刻全本”与明杨循吉影抄本、马元调刻本也多有不同，下表示之：

①参程有庆、张丽娟：《中国版本文化丛书·宋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3-68页；万曼：《唐集叙录·元氏长庆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235-236页。

②王氏云：“洪适序中谓有‘闽蜀刻本’，沅叔先生既误卢本为浙刻，又出于乡土之情，表扬蜀刻，遂以此二十四卷书题为稀世之宋蜀刻本。先生为当世藏书大家，素以版本校勘之学为世所推崇，无意造成的错误，后世亦无异言，以至此书藏入北京图书馆后，沿误称为蜀刻，迄今未得订正。”其实，王氏主要证据无非傅沅叔戊午（民国七年）之误判与张元济、王国维之误断，并无其他坚实证据。《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5期。

③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校宋蜀本元微之文集十卷跋》云：“盖抱经所见乃浙本，即上溯之钱牧翁所得及杨君谦循吉所录者，皆是也。”傅增湘谓“钱牧翁所得及杨君谦所录者”皆浙本，应该符合事实，但谓卢抱经所见亦为浙本，万曼先生从而和之（“傅、张皆云系浙本，或当有据），或不无可商榷之处。

新出志 ^①	残宋蜀本	卢见宋刻全本	杨循吉影抄本	马元调刻本
主视之	主视之	主视之	主□之	主□之
不怨不偪	不怨不偪	不怨不偪	不怨不德	不怨不德
居仆射	合仆射	合仆射	今仆射	今仆射
非盛勋烈	非夫盛勋烈	非夫盛勋烈	非盛勋烈	非盛勋烈
余亡妻	余亡妻	?	予亡妻	予亡妻
诚有	诚有	诚有	诚有	诚有
余妻之言于余	余妻之言于余	?	予之妻言于予	予妻之言于予
且以	且以	且以	切以	切以
志其终	志其将	志其将	志其终	志其终
贵称夫人	贵必有因	贵必有因	贵必因人	贵必因人
实怀其仁	怀其仁	怀其仁	怀其仁	怀其仁
没而有云	没没而有云	没没而有云	没没而有云	没没而有云

在篇目编排上,宋蜀本与卢氏所见“宋刻全本”也相同。二十四卷宋蜀本虽为残本,但目录俱完:卷一至卷四为古诗,卷五至卷八为乐府,卷九至十二为古体诗,卷十三为伤悼诗,卷十四至卷二十六为律诗,卷二十七为赋,卷二十八为策,卷二十九至三十一为书,卷三十二至卷三十九为表奏状,卷四十至卷五十为制诰,卷五十一为序记,卷五十二至五十八为碑行状墓志,卷五十九为告赠文,卷六十为祭文。据卢抱经《群书拾补》卷三五所录校记,其所见“宋刻全本”编次与此残宋蜀本完全一致。而浙本之编次则与此明显不同,其乐府诗四卷编于卷二十三至卷二十六,而卷一至卷八前半为古诗,卷八后半至卷九为伤悼诗,卷十至卷二十二为律诗,卷二十七以后散文之编次全同。

这些证据均表明,卢氏所见“宋刻全本”非如傅氏所言为“浙本”,而应属宋蜀本系统的本子。虽然如此,但并不能由此断定卢氏所见“宋刻全本”与今存残宋蜀本为同一种刻本。因为二本文字不仅小有歧异之处,而且今存残宋蜀本无集外文章与洪景伯跋,而卢氏所见宋刻全本则俱有之。

①二十世纪洛阳出土《有唐武威段氏夫人墓志铭》,为《唐左千牛韦珣母段氏墓志铭》的又一“版本”。据考,后者当为元稹稿本,前者当为韦氏家族改定本。参拙文《元稹真的是一个势利小人吗——〈从〈有唐武威段氏夫人墓志铭〉看元稹为人〉商榷》,《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1期。

今残存宋蜀本二十四卷,现藏国家图书馆。关于宋蜀本之刊刻时间,赵万里先生在其主编《中国版刻图录》中说:“传世蜀本唐人集有两个系统。一为十一行本,约刻于南北宋之际,今存《骆宾王》、《李太白》、《王摩诘》三集。一为十二行本,约刻于南宋中叶。除上举《孟浩然》、《李长吉》、《郑守愚》三全本,《孟东野》、《元微之》二残本外,尚有《欧阳行周》、《皇甫持正》、《许用晦》、《张承吉》、《孙可之》、《司空一鸣》六全本,与《刘文房》、《陆宣公》、《权载之》、《韩昌黎》、《张文昌》、《刘梦得》、《姚少监》七残本,总得十八种。此十八种唐人集,元时为翰林国史院官书,清初均为颍川刘体仁藏书,其时闻尚存三十种。”赵万里先生断十二行本蜀刻文集刻印之时间为南宋中叶,《新刊元微之文集》作为其中的一种,当然也刊行于这一时期。这一结论还可以得到元集文字内证的支持。如残宋蜀本元集卷十四《代曲江老人百韵》“尚齿惇耆艾”之“惇”,末笔缺以避南宋光宗(1190—1194)之名讳,即是一个比较有力的证明。据洪氏跋,在洪氏浙刻本之前,即有“闽、蜀刻本,为六十卷”(见下文)。这就是说,在洪氏浙刻本刊行之前,即乾道四年(1168)之前大约南北宋之际,蜀地即有一个六十卷的刻本。也许,傅增湘就是基于洪氏之跋,再加上字体等方面的考虑,把《新刊元微之文集》定为北宋刻本的。其《藏园群书题记》续集卷三《校宋蜀本元微之文集十卷跋》云:“元集残本,十卷……独此蜀本传世殊稀,惟洪景伯跋中曾一及之,历来藏书家未见著录……字体古劲,与余所藏之《册府元龟》、《二百家名贤文粹》字体、刻工绝相类。且‘桓’、‘构’字皆不避,当为北宋刻本,其中‘敦’字,间有缺笔者,则后印时所刊落也。”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难解的问题:十二行本蜀刻文集之一《新刊元微之文集》与洪氏跋中所提及的“蜀刻本”,究竟是同一种还是两种不同的本子?如果说是同一种刻本,均刊行于乾道四年之前,那么,不仅《新刊元微之文集》与十二行本蜀刻文集其他本子的关系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而且其中的避讳也无法得到恰当的说明;如果说是不同的两种刻本,它们相距的时间似乎又有些太近,不能不让人心存疑虑。因为所有元集传本都源自建安刘氏本,而刘氏本之刻印时间已是北宋宣和六年,距南宋光宗绍熙年间不到七十年的时间。在不算长的时间里,同一地区竟然出现两个元集刻本,而且《新刊元微之文集》还是在宣和建安刘氏闽刻本和乾道洪氏浙刻本之后刊行的,并未得到宋代文人特别赏识的元稹,为什么他的集子突然如此频繁地被人刊刻行世呢?这背后到底有什么原因呢?由于今日已见不到足够的文献与实物证据,这个问题也只能存疑。

宋蜀本之外又有宋浙本,宋浙本是洪适(景伯)乾道四年在绍兴刻印的。明杨循吉影抄本所附洪氏跋云:“《唐志》著录有《长庆集》一百卷,《小集》十卷。传于今者,惟闽、蜀刻本为六十卷。三馆所藏,独有《小集》,其文盖已杂之六十卷中矣。”浙本今有残卷存世,据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续集卷三《校宋蜀本〈元微之文集〉十卷跋》云:“顷在日本静嘉文库见残本三卷,存卷四十至四十二,半叶十三行,行二十三字,结体方整,槧手精湛,为南渡初浙刻正宗,其

为洪景伯刻于绍兴蓬莱阁者，殆无疑义。”其《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一二亦云：“《元氏长庆集》六十卷（唐元稹撰，存卷四十至四十二，凡三卷），宋刊本，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三字，白口，左右双栏。版心下方记刊工姓名，有李询、王存中、毛昌、周彦诸名。字体方整，仿欧体，镌工精湛，避宋讳至‘完’字止，后有乾道四年洪迈序。按：……此则乾道四年洪迈刊于明州蓬莱阁者，刻工周彦又见余藏明州本《文选》再补板中，可以为证。”又有残五卷本，日本涩江全善、森立之《经籍访古志》云：“赐芦文库藏宋槧本《元氏长庆集》残本五卷，存第四十三至第四十六，第四十八，合五卷。每卷首题‘元氏长庆集卷第几’，次行有目录，每半板十三行，行二十三字，界长七寸一分，幅五寸，宋讳阙笔，板心有雕工名氏。此本装为粘叶，盖不失宋时之旧观者。某氏又藏第四十卷，即与此同种。”二残本虽卷次、藏地有异，其均为南宋洪氏浙刻本当无疑问。上文已经提到蜀本与浙本元集的篇目编排并不相同，估计是在据闽本翻刻时做的调整。

明代较重要之抄本、活字本、刻本，有弘治杨循吉影抄本、正德铜活字本、嘉靖董氏刻本、万历马元调刻本，这些本子均源出宋浙本。《牧斋外集》卷二五钱谦益跋元集云：“微之集，旧得杨君谦（循吉字——引者注）抄本，行间多空字，后得宋刻本，吴中张子昭所藏，始知杨氏抄本空字，皆宋本岁久漫灭处，君谦仍其旧而不敢益也。嘉靖壬子，东吴董氏用宋本翻雕，行款如一，独于其空阙字样，皆妄以己意揣摩填补。”这说明，杨循吉影抄本与董氏翻雕本均依据相同之底本，即宋浙本。这一点可以从宋浙本与明杨循吉影抄本、董氏刻本均半叶十三行、行二十三字上得到证明。万曼《唐集叙录》谓“刘麟刻本，嘉靖壬子（1552）东吴董氏曾翻雕于茭门别墅”，因刘麟刻本早已不存，面貌无从得知，论断似失之审慎。马氏刻本，亦出自宋浙本。卢抱经《群书拾补》卷三五《元微之文集》云：“董、马二本虽皆云由宋本出，然宋本脱烂处，辄以意妄为补缀，有极不通可笑者。”既然董、马二本之妄补，皆因宋本之“脱烂”，且其诗文编次亦完全一致而与宋蜀本迥异，其祖本当属一种，即宋浙本。但马本亦有异于董、杨二本之处，如制造之题，每每马本繁而董、杨二本简，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明正德兰雪堂铜活字本亦属浙本系统。前引王国维跋又云：“越本颇有漫阙，后人臆补数十字，如第一卷《思归乐》、第十卷《代曲江老人》二首，兰雪堂活字本与此本均从补本上板，故讹误相同，赖建本（王氏所谓建本，实为宋蜀本——引者注）始得正之。又此本第十卷阙末二叶，亦越本失其板片，此本仍之，尚存不全之迹。兰雪堂本则以《酬白学士》诗仅存小半，乃删去之，可知越本漫阙自昔已然矣。”关于董氏本与兰雪堂活字本之关系，何焯跋曾谓：“元集误字，始于无锡华氏之活板，谬称得水村豕宰所藏宋刻本，因用活字印行。董氏不学，因之沿误耳。”（瞿良士辑《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而张元济《涵芬楼烬馀书录》则谓董氏于宋浙本脱烂处以意妄为补缀，遂成白璧之瑕：“悬揣董氏所据之本，首叶上下原纸必已损坏，文字无存。董氏原刊，乃以意补足。不然，安有同为宋刻，而两本互异之字在一叶内，均集于首尾两端者

乎？宋刻亦有讹字，惟多被剗改，反失真相，白璧微瑕，不能无憾。”关于何焯之判断，万曼《唐集叙录》曾说：“何氏所云，谅必有据”，但究竟有何根据，今天已无从得知。因此，张元济先生之“悬揣”，仍具有不容否定之价值。

除此之外，宋浙本有集外诗文（《春游》诗一首，《上令狐相公诗启》一篇），明杨循吉影抄本、董氏茺门别墅刻本全同宋浙本，明马元调本除宋浙本的集外诗文外另有马氏补遗六卷。

最后，说一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元集。四库本元集源于明马元调刻本。《四库全书总目》云：“此本为宋宣和甲辰建安刘麟所传，明松江马元调重刊。”但四库本并非马本之翻版，而是经过了四库馆臣的校勘。如四库本元集卷一《思归乐》，首句“山中思归乐”，首二字马本作“我作”；“应缘此山路”，末二字马本作“寄迹”；“一到长安城”，首二字马本作“始对”。与明马元调本相比，四库本的文字讹误明显减少。如果再把四库本与明杨循吉影抄本相比，四库本亦有数量不少的优于杨循吉影抄本之处。如数人同时授官之制，杨循吉影抄本多作“某授某官”，从题目看俨然一人授官之制，而四库本则“某”下有“等”字，近是。又如四库本卷四二《授王播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使职如故制》，杨本作《授王播中书侍郎平章事兼盐铁使制》。王播此前已为“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大中大夫、守刑部尚书”，此次迁官只是加“同平章事”，而杨本不仅脱落“同”字，且“兼盐铁使”亦作新授之职矣。再如四库本与明杨循吉影抄本卷二一全部异文如下：

题目	四库本	明杨循吉影抄本	备注
和乐天寻郭道士不遇	原注：道士昔常为僧	“道士”二字无	杨本似是
	方瞳应是新烧药	方瞳应是新烧药	杨本误
	短脚知缘旧施春	短脚知缘旧施春	杨本误
	为僧时先有脚疾	为僧时先有时疾	杨本误
酬乐天得微之诗知通州	哭鸟昼飞人见少	哭鸟昼飞人少见	杨本似误
酬乐天叹损伤见寄	前途何在转茫茫	前途何在转忙忙	杨本误
别毅郎	（原注）此后工部侍郎时诗	此后三首工部侍郎时诗	杨本似是
赠别杨员外巨源	青山憔悴宦名卑	青衫憔悴宦名卑	
寄乐天二首（之一）	剑头已折藏须尽	剑头已折藏须盖	杨本误
和王侍郎酬广宣上人	竞走墙前希得俊	竞走墙前稀得俊	杨本误

“中国语言文献与文学文献学高层论坛”综述

由中华文学史料学会古代文学史料学会、《文献》编辑部、西北大学文学院主办,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研究所、三秦出版社协办的“中国语言文献与文学文献学高层论坛”,于2007年11月23日至24日在西安举行。国内50余名学者就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

文献整理是文献学界始终关注的问题,西北大学韩理洲介绍了《魏晋南北朝文补遗考论》、《全唐文考辨》工作进展。西北大学薛瑞生、房日晰、阎琦、吴敏霞,三秦出版社赵建黎分别就文献整理和出版作了发言。山东大学郑杰文《近30年古籍整理成就与今后整理研究重点》,总结过去的成就,提出了今后的建议。

语言文献研究是重要的议题。吉林大学武振玉《殷周金文虚词研究述要》,介绍20世纪迄今的金文虚词研究。南京师大赵生群《〈左传〉训诂研究》,对《左传》昭公篇的训诂问题提出了新见。南京师大董志翘《评〈扬雄方言校释汇证〉》,介绍了最新有关研究成果。上海师大徐时仪《略论〈一切经音义〉与词汇学研究》,论述了《一切经音义》所释复音词、方俗口语词、外来词问题。南京大学刘晓南的《闽蜀同风与方言》,探讨了“闽蜀同风”的盛行与消弥的缘由。西北大学刘百顺《连词

比较两本异文,参考卢文弨校记及其他元诗版本,可确定明杨循吉影抄本错误者六处,疑似错误者一处,而疑似正确者仅两处,另有一处暂不确定。不难发现,四库本文字明显优于明杨循吉影抄本。四库本既较杨循吉影抄本篇目全(有马元调补遗六卷),而且文字讹误也比较少,但并未引起学者们的重视,迄今为止的元集整理本均采用明杨循吉影抄本为底本,而从未有人考虑用四库本作底本,甚至在校勘时也把四库本弃置一旁。这其中的原因,可能与四库本以马本为底本而马本本身名声不甚好有关。

对元集版本系统的梳理,有助于我们明白两个重要问题:其一,现存元集分为两大系统:浙本系统与蜀本系统。残宋蜀本、卢抱经所见宋刻全本,构成蜀本系统;残宋浙本、明杨循吉影抄本、正德华坚活字本、嘉靖董氏刻本、万历马元调刻本等构成浙本系统。浙本系统的本子现有完本存世,蜀本系统的本子仅存二十四卷余。其二,选择整理元集时的底本,明杨循吉影抄本不是唯一的或最好的。四库抄本元集在收录作品完备性与文字正确程度上都高于明杨循吉影抄本,应当引起学者的重视。

作者工作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